

· 学术探索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重读马克思”: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

聂锦芳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重读马克思”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世界性的重大事件。它并不是属于纯学术研究范围内的现象,而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并且体现出理论发展的内在诉求。在当代新的现实境遇下重新阅读马克思的著述,必须依据权威版本和原始文献,以文本和历史为基础,将基本原理和时代化结合起来,清理他对西方思想传统的继承和超越、辨析他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探究,使我们对其思想的理解更加全面、客观、准确,同时也有利于实现马克思思想的当代发展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关键词]马克思;文本;思想;现实化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7.001

一、“重新阅读和理解马克思”何以必要和可能

“重新阅读和理解马克思”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世界性的重大事件。它并不是属于纯学术研究范围内的现象,而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并且体现出理论发展的内在诉求。

从国际上看,主要的触发因素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它们对这一世界性的事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苏联70年的历史改写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但是它最后走向了崩溃,因此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引起了极其巨大的反响。一方面,在西方,诸如“历史终结论”这些论调兴起,人们普遍认为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将一统天下,马克思主义和社

会主义已经彻底过时。但是这种乐观的预测,在随后几年爆发的金融动荡及其带来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中就迅速破产了,人们发现,权力和资本仍然是塑造和支配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力量。我们知道,马克思毕生进行资本批判,这种情况下,他当年的批判力量再次体现出当代价值。另一方面,在东方,人们也开始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追问:影响深远的苏东事件到底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启示?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思想本身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关系?于是就出现了一系列概念序列:“马克思”—“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1]这清楚地表明,马克思身后流传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之间并不完全是一一

作者简介:聂锦芳,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

对应的关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回到文本,回到原始语境,重新理解马克思,就成为国际学术界和致力于重大社会问题思考的人们的基本共识。

而在中国,当改革开放这场深刻的社会运动序幕揭开的时候,对此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邓小平总结长期以来中国革命和发展的经验教训时,说过一句非常沉重的话:“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2]邓小平是从政治的角度讲这段话的,但是这句话重心长的告诫对中国学术界也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学者们深刻反省了过去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意识到我们大多数人知道马克思,但是基本上是在对他的原始著述很不了解的情况下,通过教科书来理解他的基本观点和思想的。即便接触到一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普遍采取的也是断章取义和寻章摘句的做法,这严重肢解了马克思思想的完整性,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与国际、国内这种历史和现实背景相映衬,近年的全球化态势也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勃勃生机外,整个世界可以说处于一种愈益错综复杂的发展状态,特别是疫情的爆发把全球推向了更为莫测的境地。三年来,世界的总体表现令人失望,各个国家之间的整体运作与普通百姓的切实感受之间呈现出严重的错位情况,盘根错节的问题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会发现,一些重大的问题貌似是突发的,实际上是多年累积而成的,很多新奇的现象仿佛是瞬间涌现的,但从长时间段上看,某种程度上是历史在轮回和重现。

而每当世界上出现普遍性危机的时候,人们总会想到马克思。他毕生致力于对资本和权力展开批判,对现代社会进行探索。他在19世纪写下了众多著述,身处21世纪虽然我们虽然不能从中找到解决当代问题的具体举措和方案,但是他当年的思考对于我们仍然有相当大的启示,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与现在仍有一种同构性的关系。因此,我们从他思考的基点出发,对目前的状况

展开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可以对当代社会有一种更为深刻的透视。

以上是从社会发展的实践角度出发所作的分析。而从理论发展的内在诉求和趋势看,可能只有专业的文献专家知道,尽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的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但是事实上,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部囊括马克思全部作品的全集出版。我们去图书馆看到的那套已经发黄、黑皮封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中文第一版,它并不是马克思著述最完整的版本,而是照搬俄文版的编辑方案、选目进行翻译的。马克思的著述80%以上是用德文写作的,这就意味着,苏联文献专家得首先把马克思的主要著述由德文翻译成俄文;而我们中国的翻译家再根据俄文来翻译,并没有直接依据德文进行翻译。众所周知,语言并不仅仅是工具和符号,它主要或者首先是一种思维方式。当我们不能直接阅读马克思的德文原著时,特别是在语言转换过程中那些核心概念的内涵出现损益、变化,不能为研究者完全把握时,对原始思想准确性、完整性和深刻性的理解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只要能力和条件允许,最好回到马克思的原始著述中进行阅读和理解。当我们的中文翻译依据俄文进行,而大多数研究者又依据中文版来研究的时候,则需要首先检视这些版本的权威性和可靠性。我们会发现,俄文版的编纂实际上是对马克思的大部分著述进行不同程度的编排、组合和选择而来的。

马克思是一个特殊的思想家。他1818年出生,1883年去世,享年65岁。在这一过程中,尽管他的思想和学说强调实践性和革命性,但就其基本的职业和身份来说,他是一个学者、理论家,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斋中度过的。他出生在德国,年轻的时候参加过社会运动,但很快就被普鲁士政府驱逐。他先去了法国巴黎,然后流亡到比利时布鲁塞尔,最后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英国伦敦度过。这种经历使他不可能成为一个“体制内”的思想家。他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主要是基于他对社会变革的期望。于

是,就出现这样一种特殊的状况:他一生都在写作,但是成型和定稿的作品却非常少,他绝大部分著述是没有完成的,包括他最重要的著述、代表作《资本论》。他留下的庞大的手稿是他那些成型著述的初稿、提纲、笔记、摘录和过程稿、修正稿。他在世时发表的作品不到其全部著述的1/3,绝大部分流传下来的是手稿。如果学过哲学史,就会知道,对于一个思想复杂的哲学家来说,其思想观点最重要的内涵,并不完全体现在其明确的表述中,而是包含在这些思想观点的形成和论证过程中。而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的复杂思考,大部分也留存在这些庞大的原始手稿中。对马克思著作的编辑来说,最权威的版本当然必须依据其原始手稿,文献编辑者只能对其散乱的文字笔迹进行辨认,而不能对其内容有任何挪动、“嫁接”和修改。这个最权威的版本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考证版”,即现在学术界广为人知的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以下简称 MEGA)。这个版本原来计划出 160 多卷,东欧剧变以后修订了出版规划,确定为 114 卷,迄今为止纸质文本出版了 69 卷 77 册,数字文本公布了 3 卷。

这个版本的特殊性在于,文献专家先根据马克思留下来的庞大手稿进行辨认,然后在“文本”卷之外,每一卷都附有一个篇幅很大的“学术资料”卷,告诉读者,编者是怎么根据马克思的原始手稿辨认、编辑的,该文本经过什么样的版本源流。这个版本才是马克思著述的全集。它所刊发的大量新的资料,提供了重新客观、完整、深入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文献基础。改革开放 40 年,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才自觉意识到应该基于 MEGA 版本来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思想。这是我们提到的一种理论发展的状况。

我们知道,1949 年之前,特别是在延安时期,甚至更早之前,中国就开始了马克思著作的中文翻译。但是正如上文提到的,1985 年完成的中文版《全集》50 卷是根据俄文翻译的,因此

这一版本刚刚出齐之日,就是新的中文第二版上马之时。就是说,新版本必须依据原始文字翻译,马克思是用德文写作的,就基于德文来翻译,他用法文来写作的,就依据法文来翻译。这一版本大概有 60 卷的规模,迄今为止出了 30 多卷。

必须指出,中文第二版全集并不是 MEGA 的直接翻译。MEGA 的“学术资料”卷是不能翻译的,它只供那些精通德语或欧洲语言的人理解马克思阅读和研究之用。它提供了大量的考证材料,而这些考证材料要翻译成中文,篇幅将极其巨大,此外也不太好翻译,要用中文把写作、修改过程再现出来,非常困难。当然,较之于中文第一版,第二版要算比较权威的了。后来中央“马工程”上马之后,我们又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2012 年又重新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应该说,就《文集》和新版《选集》收入的著述来说,其中文翻译更为精准了。依据这一版本提供的材料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较之于第一版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核心概念由德文直接翻译成中文,其内涵的损益程度会降低,就使我们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把握会更为准确。

正是以上国际、国内学界的综合状况,促使我们重新阅读和理解马克思成为必要和可能。

二、马克思著述的权威版本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划分

下面我们谈一下马克思著述的构成情况,这直接关乎对他原始思想的把握。MEGA 将马克思的著述分为四个部分来刊发,第一部分是《资本论》之外的其他著述,包括他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著述和大部分时事评论。第二部分为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按照我们以前的理解,《资本论》是一部“三卷本”的著述,但是如果回到马克思的原始著述就会发现,MEGA 提供的《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有 15 卷 23 册。这么庞大的篇幅、规模与“三卷本”相比,后者只是很小的部分。而就“三卷本”来说,中、

英文的翻译依据的是“通行本”，即第一卷是按照马克思去世之后由恩格斯编定的德文第四版翻译的。根据这个版本，马克思在世的时候由他本人定稿、修改的德文第一版、第二版、法文版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是看不出来的。事实上，通过文献学的考证，这几个版本以及后来的德文第三版、第四版之间，不仅仅有字词、表述的变化，还有结构的调整。这种结构的调整透露了马克思对资本问题的新思考。如果不回到 MEGA 提供的这些材料，不通过不同版本之间的考辨，我们就看不出马克思思想变化的这种曲折性和复杂性。

MEGA 第三部分是书信卷。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占了相当大的部分。与那些正式写作的著述有所不同。这些书信除了交代他们的个人生活、与他人之间的交流以外，大量的内容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及其他人一起讨论有关当时社会的复杂状况、《资本论》的构思以及研究资本时代的必要性和艰巨性。换句话说，《资本论》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不仅仅是马克思本人写作的，也是同时代那些睿智的思想家共同参与的一个巨大的思想建构工程。如果不理解这些，不从这些书信中挖掘马克思丰富而深邃的思想，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就会陷入简单化、平面化、肤浅化的状态。

MEGA 第四部分是摘录、笔记卷。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象的探究，并不是自马克思开始的，古典经济学就给他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启示，甚至提供了展开讨论的原始话题和思路。马克思思想跟西方文化传统有极其密切的关联，如果撇下西方文化传统，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思想基础，是无法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新变革的。因此，他在正式著述写作之前做了大量的摘录、笔记。这些摘录、笔记的数量极为庞大，MEGA 第四部分收集了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其思想有酝酿、积累、分析的过程。这些摘录、笔记是他阅读最权威的著述时留下来的记录，他一开始是根据这些著述本身的结构来摘录的；过一段时

间，他会打乱结构，根据问题来摘录；最后逐渐把原作者的整个论证和原书的结构打乱，由他自己提出一个新的结构。当这种新的结构拟定出来的时候，他就在此基础上开始了自己著述的写作。我们验证了他很多著述的写作过程，都是相同的路数。我们知道，《资本论》最重要的初稿是《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而在这个初稿形成之前，他就留下了《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和数量庞大的《伦敦笔记》，还有 1856—1857 年的《危机笔记》。如果不对这几本笔记进行研究，我们就会发现，1857—1858 年讨论的问题会显得非常突兀。因为《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也处于草稿状态，没有这些笔记作铺垫，想要理解其中表达的思想，将非常困难。当代西方文献学已经提供了这么丰满的材料，所以，我们要重新理解马克思，必须奠基于新的时代境遇和权威的文献基础之上，这样才能获得对马克思思想的完整性的理解，进而讨论其当代价值。

按照笔者的理解，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包含了四个相互关联，但也各自独立，不能完全混淆，更不能替代的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文本、文献。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首先要阅读他的原著，否则就会陷入思辨、空洞和抽象，而陷入这些困境，是 20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常见现象。我们习惯于从当代的政治立场、流行观点出发，去马克思的作品里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最后证实我们立场、观点的正确性。由于马克思当年探究的内容、范围和程度非常复杂，即便是当代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也会有苗头和征兆。如果从当代的立场去那里找痕迹，肯定能找到只言片语的论述。但实际上，同样的问题，当代与马克思那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内涵乃至结构的变化。如果不厘清两个时代的差异，将关于相同问题的结论直接对应，就会出现把马克思的思想和观点无原则地当代化、现实化的做法，实际上最终体现不出其应有的真正价值。因此，阅读文本、文献是把握和理

解马克思思想非常重要的基础。

第二个领域是历史。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态和变化过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它既包括思想理论史,也包括社会运动史。整个20世纪,以马克思学说为指导所展开的社会运动,对马克思思想及其体系的阐释和发挥,已经对其19世纪的形态有了极大的突破。如果不把这些历史变迁与原始形态进行比较,就看不出后者在20世纪的效应及其曲折性,也不清楚这种变化的过程、原因和意义。例如,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并不是带有深刻的政治背景、阶级立场和思想观点的范畴,它表征的是人们观照世界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从观念出发来观察、把握外在世界的,是对现实世界一种不客观、不正确甚至歪曲的反映。但是这一概念到了列宁、葛兰西等人那里和20世纪,其内涵就演变成了一个带有政治、阶级和经济意蕴的观念体系和价值立场。这样,我们现在谈论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指的就是政治性和阶级性。与马克思那时的理解,即对人类社会复杂结构中观念和精神的歪曲的反映这样的意思相比,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不仅如此,像我们熟悉的一系列概念,如“阶级”“政党”“国家”“共同体”“个人”“革命”等,在20世纪都有很大的内涵变迁,更不要说社会实践的巨大变革了。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和总结,也是透析马克思及其影响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三个领域是原理。对文本文献和历史的讨论必须上升到基本原理的层次。所以,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基本原理非常重要。但是,仔细地甄别就会发现,我们大多数人学习、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并不是首先阅读他的原始文本、文献,而是根据原理教科书的内容来掌握的。这就把本来的顺序和逻辑弄颠倒了。长期以来流行的原理教科书是在马克思主义流传过程中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特定的把握、理解和阐释,即苏联1930年代形成的体系、框架。马克思

本人并没有写出系统表述自己哲学原理体系的专门著述,《资本论》阐发的是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形而上学”基础,但并不是哲学原理本身的系统阐释。根据马克思的原始文本和思想逻辑来把握和概括其哲学原理体系,就成为一个必要但很艰难的事情。应该说,这种哲学原理究竟是什么,迄今为止并没有赢得大多数人认同的概括和把握,但有一点是比较肯定的,它跟以往的哲学教科书所体现的情形并不等同,甚至有比较大的差别。举一个例子,马克思登上德国思想论坛的“亮相之作”是他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是自由和自我意识。自由对于我们理解世界和确立人在世界上的意义来说,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和价值。马克思的说法是,自由充满至高无上的“神性”。但是,“自由”是在以往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中最后一章讨论“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时候出现的。笔者并不否认支撑教科书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理性,但是同时也必须明确,它跟马克思的整个论证构架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还有一个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是从板块结构,通过划分为不同学科来阐发的,即将其分为哲学原理、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而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板块结构和学科分野。比如,马克思的认识论就是资本认识论。但在哲学原理教科书中,认识论却围绕反映论来抽象地进行阐发,而没有把马克思对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运动(特别是资本社会)的把握和理解纳入哲学认识论的范围,而把《资本论》的内容放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讨论。但是,马克思哲学的制高点并不在那些哲学著作(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中,而更主要体现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及其手稿之中,也就是说,《资本论》中的思想才是马克思哲学的高峰。就马克思的认识论来说,其内容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阐释的关于资本

社会的认识方式,即“普照光的方法”“从后思索的方法”“人体解剖的方法”“抽象—具体的方法”等,这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哲学认识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水准和高度。而教科书所阐发的认识论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它认为存在一个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然后人去认识它,反映它的状况,一次不行两次,乃至反复多次,最后一定会获得对外在世界的完整、准确的把握。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我们所处的世界不只有与我们无关的、异质的、自在的领域,更有与我们息息相关甚至本身就是人的活动参与建构的社会现实。这就是说,对于社会现实来说,主体和客体是纠缠在一起的,不可能截然区分开来。因此必须采取如马克思把握资本的逻辑和运动那样的方式,作结构性的分析和透视,才可以获得对这样迄今为止最复杂的社会认识。

第四个领域是现实化,或当代化,乃至我们所谈的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影响最大的领域。谈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最热门的就是中国化研究。但是,“中国化”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研究及其影响,它必须基于原始文本文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变迁和对基本原理的准确把握,来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另一种是说话、办事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展开和进行,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工具和符码,认为只要拿上这个“套子”去套中国的实际,或者试图拿上这把“万能钥匙”去解开中国的难题,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成为一种耳熟能详的表述,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和实践之间,目前还处于一种异质的状态。所谓“化”,应该是不同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融合。按照笔者的理解,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源自西方源远流长的人道主义、启蒙精神、科学理性等,然后在批判、传承、创新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的权力和资本进行考察,凝练出一种科学

的、现代思维方式。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在长期的农业文明和封建统治基础上形成并且起支配地位的,注重人伦关系和等级秩序。这样一种观照和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要想达致一种融合状态,就需要对传统思维的意义进行大量的现代性研究。在现时代,社会结构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起着支配作用,任何国家和民族根本无可回避,又为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所缺少的,就是资本。马克思的学说可以说是资本时代的“产儿”,是他顺应“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大趋势,透析资本对世界历史的拓展、改变和效应,来对现代社会进行探索的结果。而我们的传统文化,适应的是长达几千年的东方式社会状况的思考方式,如果不实现自身的变革、蜕变和转型,很难具有现代价值。

这就是笔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就是说,文本文献、历史(包括思想发展史和社会运动史)、基本原理和现实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完整图景和总体构架。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中当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普遍看重的是后两个领域,即基本原理和现实化。当然不能说这没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走得太远了,原理和现实化没有文本文献的基础,离开了历史发展,那么就会架空马克思及其思想流变,据此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阐释就没有根据,变成为“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思路和习惯迄今为止仍在发挥影响甚至占据主流,如果继续听任其流行,会使“重新阅读和理解马克思”不可能获得实际成果,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很难获得实质性的推进。

以上所谈是我们展开“重新阅读和理解马克思”的背景、马克思文献的基本状况,以及笔者对以往马克思主义思考、研究方式和当代状况的一种反思。

三、马克思对西方思想传统的继承和超越

那么,基于当代现实境遇,依据马克思已经

刊布的原始文献,再加上我们长期以来的研究积累、经验和教训,可以对马克思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作出什么样的新理解和评判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是马克思对西方思想传统的继承和超越;二是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探究。本节我们讨论前一方面。

由于特殊的时代境遇、实践发展和学科分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不少论者倾向于把马克思的思想从西方文化传统中剥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建构和价值取向予以理解和阐发。而根据马克思的原始文献,可以知道,离开西方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的土壤,不可能客观到位地把握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比如,我们长期以来把马克思当成一个无神论者,马克思也确实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3]这样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时候就把马克思这方面的思考与西方源远流长的基督—犹太教传统彻底隔离开来了。但是,当我们去马克思出生并接受最初教育的特里尔,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宗教文化氛围极其浓厚的地方。而阅读马克思写作并留存下来的文本,更可以发现,他与西方宗教的关系极为复杂。“特里尔传统”是一个无形的“文化场”,在那座面积不大的小城,保留着十几栋古罗马时期的建筑。换句话说,特里尔古城现在街道的状况与200年前马克思生活的环境相比,没有多大改变。那些巍峨耸立的古罗马建筑及其蕴含的宗教氛围、情怀,经过千年风雨的洗礼,成了马克思最初成长的环境和背景,加上启蒙主义教育和大量人文经典蕴含着的情愫,植入其幼小的心灵,再加上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复杂状况,使其思想结构中呈现出一幅将对传统的传承、批判和超越与变革现实的渴望和诉求相融通、结合、嫁接的图景。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重新理解马克思必须阅读原始文本,特别是年轻人学习德语非常必要,因为根据原始表述更有助于准确地把握其思想。就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来说,在

中文语境中“鸦片”是一种毒品,如果吸食了鸦片,就意味着人的生命的毁灭。但在德语中,在马克思那个时代,鸦片是一种镇静剂,做手术的时候用它做麻醉,或者是人在感到非常烦躁的时候吸食一点使其安静下来。马克思并不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宗教安慰是摆脱人的困境的最终途径,相反,要想根本解决人的异化和危机需要改变其经济、政治处境和地位,但马克思不否认宗教对于人的心灵抚慰、情感调节以及信仰的价值。笔者写过一本很厚的书《批判与建构》,有70多万字,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很重要的著述《德意志意识形态》详尽的解读。后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其中篇幅最大的部分是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批判,这是当时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哲学家施蒂纳轰动一时的著作。

施蒂纳这部书分为两个部分:“人”与“我”。他认为,人在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对纯粹精神的追求,因此必须先由“非人”状态转换为“人”的状态。但是到此还不够,又必须转化为“我”。“我”就是要建构、彰显个体的唯一性和独自性。这是他整部书论述的结构和逻辑。马克思对其思想的批判也按照这本书的结构来展开:第一部分“人”,马克思写的标题是“人:旧约”;第二部分“我”,马克思写的标题是“我:新约”。笔者原先解读这些部分的时候谈及马克思起这个标题的用意,将其解释为马克思从小在特里尔所受的宗教教育,以及他阅读施蒂纳的书引发的灵感,并认为其思想具有类似“宗教”式的实质的定性。《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在布鲁塞尔共同写作的。那时笔者虽然去过布鲁塞尔,但是没有考察过马克思等人写此书的具体地点。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时候,笔者作为德国“马克思年”国际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利用赴德参加有关活动的机会在那里待了三个月,期间得以重返布鲁塞尔,找到了马克思当时居住的野树林街19号,在一道斜坡的尽头,这个街道的样子没有什么变化,斜坡

对面标明的 20 号就是著名的圣米歇尔大教堂。这个大教堂已经存在了 300 多年,换句话说,马克思写作这部书的时候这个教堂就矗立在那里。教堂每隔半小时敲钟一次,可以想到,马克思构思这部著述的时候,把“人”归为“旧约”、把“我”归为“新约”,既讽刺施蒂纳这部著述的“宗教”意味,同时也是宗教对其思想建构另一维度的感性启示。作了实地考察之后,笔者进一步意识到,离开宗教不能把握西方现代社会,包括理解资本主义。马克思是现代社会的批判者,如果他完全撇开宗教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塑造,那么他的把握就不可能是全面的、到位的和深刻的。上文说到的西方文化传统对马克思思想的哺育,包括了近代以来的人文主义、科学理性、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学说等方面内容,自然也不能排除深厚的宗教传统。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性变革,那么它与西方思想之间当然有决裂、质疑和批判,但是将二者的关系强调到极端,而不把它们与传承、延续、前提和基础联系起来,我认为是很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马克思对西方传统确实进行了批判,但这种批判是德国哲学式的批判,不是抛弃、埋葬和消灭,而是在反思基础上的传承、延续和创造。这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目前的理论和文化形态主要有中、西、马三个板块和结构,三者之间是并列关系,但从真正的思想渊源和发展演变来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传统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在重新研读马克思著述时牢记这一点非常重要。就马克思的文本看,虽然其中没有一个概念(包括“实践”“生产”“资本”这些重要范畴)是他独创的,但回到西方那些重要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的著述中,就会发现马克思结合资本时代的变迁对相关问题及理论作出了独特性的阐发和创新,这就意味着只有还原到西方思想史的源流中予以观照,马克思的思想才可以获得到位、准确的理解和客观的评价。

以下我们分析一下马克思哲学思想发生转变的线索和实质。

按照传统的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哲学思维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政治立场由“革命民主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所以,在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中,我们习惯于到马克思著述的通行本中寻找相关概念及其阐释,找到了“唯物主义”,就意味着这部著述中和这一时期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成熟”了;找到了“科学社会主义”,就认定他已经超越了“革命民主主义”。这是典型的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的做法。如果回到马克思原始著述,研究他在特殊语境下的具体论证,就会发现,马克思在思考复杂的现代社会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是其出发点。尽管他是一个思考者、理论家、哲学家,但他思考的基点不是理论本身和哲学形态,而是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启示他,用单一的思维方式透视清楚这种复杂性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其一系列著述中,他对迄今为止哲学史上提供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思维方式都进行了深刻的解剖,切中肯綮地指出它们的症结和长处。在马克思早期的著述中确实深刻地批判过唯心主义、赞扬了唯物主义,但他同时也质疑和否定了唯物主义的“无所作为”“认同现状”,就是说,他的著述中对唯物主义的批判一点也不比唯心主义少。那么,其就必须对既有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哲学形态进行基于“新哲学”视角的分析。这一点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所以,马克思思考世界的方式、他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革,既不是基于唯心主义立场,即不是从主体、精神、观念出发,也不是基于唯物主义立场,即从单纯的客体、物质、自然出发,而是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现实表现和变化发展出发。

那么,主体、精神、观念与客体、物质、自然之间相互关联的中间环节是什么?是社会实践、是人们的现实生活。以往的哲学在追问:世界起源于物质还是起源于精神?这是“形而上”的“第一哲学”和超验哲学。而马克思着重考虑的是这

种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之外的现实,或者更准确地说,什么样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有助于认识社会现实。实践是复杂社会的具体运动,是每个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实践不是凝固的点,不是凝固的实体,而是关系、活动和过程。人的现实生活处于特殊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处于远不平等和社会状况和条件之中,人不满足于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现有的状态,但又无法超越这种环境和状态。这样的情形下,以往那种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抽象地追问事件起源于物质还是起源于精神的哲学探讨,在近代复杂的社会和生命状态面前,已经过时了,不能有效地透视了。马克思的世界观不同于一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其基石是现实的社会实践和人的对象性活动,以此“新”的世界观所凝练的有效的思维方式,马克思解开了自然之谜、社会之谜和人类之谜。所以,马克思哲学探究的对象,不是抽象的世界,而是现存的世界;不是宇宙本体、观念本体,而是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状况。这样,马克思就实现了哲学的变革,在关乎哲学的对象和主题方面实现了根本性转变。这种变革使马克思的理论离开了传统的哲学、纯粹的哲学,正因如此,有些人不承认他的哲学家身份,比如,西方有些哲学史著述要么不把马克思列入论述章节,要么即便列入,也将其视为黑格尔哲学的余续。对此,我们有必要指出,不只是马克思,就是黑格尔在其哲学探讨中,也触及近代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而黑格尔的思维方式确实给了马克思很大的启迪,但马克思超越黑格尔之处在于,他写出了《资本论》,而黑格尔写不出来。对于近代社会来说,最艰难的课题恰是理解资本、理解资本运动的逻辑和过程,以及如何摆脱资本对我们的控制和塑造,而这自然也是最为重要的需由哲学探讨的课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以他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建构的“新哲学”,完成了对传统哲学的变革,将哲学推进到现代水准。

四、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未来社会的探索

马克思的思想既是对西方文化传统传承和超越的产物,更是深入观察、剖析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状况的结果,这涉及马克思复杂的资本批判理论以及他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探索和论证。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是通过《资本论》来阐发的。谈及《资本论》,大多数研究者基本上将其视为一部业已完成的、由三卷来构成的著述,并且依据对三卷内容的解读来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这种思路和做法缺乏真实、完整、权威的文献基础。正如前文所指出的,MEGA 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15卷23册于2012年出齐,再加上第三部分“书信卷”第8—35卷大量涉及《资本论》的通信,以及第四部分“摘录、笔记卷”与《资本论》相关的文献的发表,马克思准备、写作、修改、整理这一著述的曲折过程被完整地呈现出来。就是说,《资本论》是一个庞大的手稿群,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随着马克思对资本社会观察和思考的深入,《资本论》的叙述方式和结构框架发生过很大的变化。1863—1865年他按照三卷四册的构思完成了初稿,之后从中整理出《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在此之后,他没有允许这一版本重印,而是对此展开了新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一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完成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整理工作。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虽然不认为马克思最终放弃了《资本论》的写作,但是很显然,更为复杂的社会状况、视野的拓展和对资本问题的进一步探究,使马克思对原来的三卷结构进行了新的反思。

马克思生命历程的最后16年,即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到他1883年去世,其写作量极为庞大,手稿总量远超三卷初稿。但是他没有写出像《资本论》第一卷那样系统表述其观点和体系的著作,而是留下大量散乱的摘录、笔记、草稿、札记等。这种情况为我们把握和理解马克思晚年复杂的思想增添了很多不便和难度。但

是即便如此,我们根据马克思留存下来的文献,也可以看出他的资本理论的变化和发展。必须指出,单凭“通行本”三卷所勾勒出的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与依据马克思与《资本论》相关的完整的原始文献所理解的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是不完全一致的。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资本是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运动,而对于如此复杂的时代及其问题,采取单一的态度,肯定是不客观、不全面和不深刻的。

根据《资本论》“通行本”三卷,我们对资本的认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资本通过暴力和罪恶完成了原始积累。《资本论》第一卷中,这样的论述非常之多。最有名的一句话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马克思为我们描绘了原始积累的残酷性。就欧洲来说,从15世纪最后30年到18世纪末,资产阶级用最残酷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剥夺农民土地,剥削工人劳动,可以说犯下了累累罪行。然后,又开始海外殖民掠夺,甚至贩卖黑奴,使整个世界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推进和深入,呈现出非常不平等的状态。这是马克思揭露过的资本原始积累非常突出的一个方面。

第二,资本借助雇佣劳动制度追逐无限的利润。资本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经济运行和财富积累方式——雇佣劳动制度,它把整个社会成员分为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集团和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群体。劳动者在人口总体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由于他们没有生产资料,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依附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通过劳动者的艰辛劳动,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在这些财富中,除去劳动者的酬金(工资)、生产成本,剩余的部分就是利润。而这些利润都被资本家拿走了。所以整个资本运转的过程,就成为资本家不断追逐利润的过程,结果使社会呈现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状况。为社会财富的创造付出巨大艰辛的普通劳动者,得不到与其劳动付出相应的实惠和成果。相反,拥有资本、掌握了生产资

料的资本家却把绝大多数财富攫取在手里。资本运动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当然,资本的形态和运动方式也会不断改变,但即便进入数字化时代,资本剥削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只是其残酷性变得更为隐蔽,这也导致贫富差距实际上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即便在西方那些实现福利政策和“均富”措施的国家和社会也是如此。这是马克思对资本本质揭示和透析最为深刻的体现。

第三,资本运动必然引发普遍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只要有资本,就必然伴随着竞争,竞争加剧,就会引发危机。资本社会始终处于矛盾状态——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普通大众消费能力之间的不匹配,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等。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会导致周期性的经济混乱的发生,经济混乱又会使社会陷入危机,由经济领域再扩展到整个社会层面,乃至政治、意识形态领域。苏联把这叫作资本主义“总危机”。总危机的爆发、矛盾积累的尖锐化,就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爆发战争和革命,这是资本运动的必然结果。

这就是我们以往所把握和理解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资本观”。

但是,马克思是一位辩证论者,《资本论》是其运用辩证法创作出的杰作。如果不仅仅局限于研读《资本论》三卷而是扩展到《资本论》的全部手稿,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在揭示资本制度罪恶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它对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相反,他也非常看重资本另一方面的功能,将其称为“资本伟大的历史方面”“伟大的文明作用”和“资本的文明面”——这都是马克思在其著述中明确的说法。这意味着,对于资本这种现象和运动,马克思也从另外的角度揭示了它所具有的正向功能和效应。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资本改变了传统的“时间—空间”观

念,带来世界观的巨大变革。在资本支配世界之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碍于高山大海的阻隔以及其他自然环境的限制,只能是局部的发展和区域性的发展,或者单纯借助战争展开交往和交流,但很显然那是通过武力、强权进行的,烧杀抢掠,生灵涂炭,非常残酷。是资本改变了这种方式和进程,它打破了国家、民族的界限,在世界上游走,通过财富的积累,把整个人类社会融为一体。英国人发明的一种生产工具、一部新的机器,特别是技术上的进步,就会夺走印度和中国工人的饭碗。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开辟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替代。不仅物质生产是这样,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因此,各个民族的物质、精神产品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公共财产,使得过去那种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形成了一个世界化的状态和全球性的态势。马克思是世界上最早讨论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思想家之一。他说,资本的这种运动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摧毁了一切的“万里长城”,征服了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使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应,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把握和感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随着生产不断地发展,社会不停地运动和变化,永远的不安定和动荡,僵化的关系和素被尊崇的观念只要停止下来就会显得过时,这就是资本对旧世界的摧毁和对新世界的“塑造”。比如说,对“时间”的理解,传统的时间观念是自然的、物理的,像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等等。但是在资本进入之后,我们原来关于时间节奏的把握和领会就完全不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断地变革、不断地变动,按照自己的感受来确定时间的长短成为常态,有了“一日千里”“时光如梭”乃至“度日如年”之叹。这是资本所带来的时间观念的重大变化,同样也延伸到对“空间”观念的重新理解上:这才是真正世界观的变化。从中我们也可以看

出,马克思的观念实际上是非常新颖和超前的,据此他触摸到现代社会变动的脉搏和节奏。这些资本运动带来的世界观的变化,被马克思深刻地描摹和揭示出来了。

二是资本积聚起庞大的社会力量,使人类实现了对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普遍占有,创造出无与伦比的生产力。在以往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人们自给自足的状态下,缺少把分散的劳动者和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的力量,无法向自然界开战,进而获取巨大的物质利益,也不可能开拓和建构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关系,形成庞大的社会集团和共同体形式。只有资本积聚了庞大的社会力量,完善了现代社会的结构,进而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成果。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成为“真正的人的力量,成为人的对象”,这在以往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人类社会的结构也只有到资本主义社会才完善起来,从而使资产阶级成为新的人类发展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近代的自然科学发明、技术进步、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等,基本上都是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创造的,其对人类精神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特别感慨,他说:“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5]

三是资本社会孕育着新社会的因素,为人类走出资本困境,向更高形态的文明社会迈进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社会充满了矛盾和对立,但要超越资本困境,解决资本的矛盾,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外建构一个与其完全没有关系或者只有异质性关系的社会形态,创造出“没有矛盾和对立”的“人间天堂”。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相反,在他看来,资本社会奠定的雄厚的物质生产力基础、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合而成的贫富悬殊的阶级结构,为人类解决资本问题创造了条件。在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德国哲学理

解世界的方式对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是在一系列对立的范畴中解释和阐释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比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劳动与资本,等等。那么,这些范畴之间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它们在现实中是如何表征的?又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处理这些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笔记中,特别提醒我们从德国古典哲学的意义上区分“对立”和“矛盾”内涵的不同。“对立”的含义是两个因素之间可以没有关系,比如说红与绿,你不喜欢红,可以喜欢绿,这两种态度和方式之间可以没有实质性关系。但是对于“矛盾”关系来说,二者却是彼此紧密相关、互相规定和制约的,没有一方,另一方面也不存在,比如,红与非红。长期以来我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关系理解成“对立”关系而非“矛盾”关系,按照后者,没有无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反之亦然。但我们以前的理解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解决是通过无产阶级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来实现的,理由是,无产阶级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被资产阶级剥夺了,所以必须“剥夺剥夺者”,最终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理解为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原来作为贫穷者的无产阶级打倒富裕的资产阶级,实现了社会财富和阶级地位的颠倒和替换,无产阶级成为拥有财富的资产阶级,原来富裕的资产阶级沦落为贫困的无产阶级。必须指出,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目的是变革形成阶级矛盾和贫富悬殊的社会制度,所以反对、消灭资产阶级,最终也会将自己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了。两个阶级只有共同过渡到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态,才不再有富裕与贫困之间的差别,他将这样的社会形态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内才能培育和拥有超越资本困境的新的社会因素;只有在资本的范围内、资本的运行中,才能完成对资本的超越。

以上是我们通过阅读马克思有关《资本论》

的原始文献概括出来的他对资本的另一面理解,即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和“伟大的社会贡献”。在笔者看来,只有把关于资本的前一个方面的阐释和后一个方面的理解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才能再现和把握马克思完整的资本理论。

全面超越资本困境将使人类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那么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本质内涵呢?我们来探究一下。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但必须指出,对马克思毕生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具体内涵的理解,是存在很大分歧的。同样地,如果不基于原始文献进行清理和甄别,既无法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当年的深邃思考和宽广意涵,也无助于在当代新的境遇下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这里特别需要辨析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解放”,还是“普遍的个人的解放”。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等同于“人类解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实践中也曾有一句响彻云霄的口号,即“解放全世界”“解放全人类”,这可以说是我们长期以来追求的一种梦想和愿望。然而,殊不知,这恰恰是马克思当年竭力深究、想将其撇清的一种观点和思路。

马克思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有两大因素使人类的发展遭致极大的困境,一个是政治权力,另一个是资本。它们在社会结构中起着支配作用,当然二者作用的发挥也有程度、层次、深度上的差异。在此之前的封建社会,政治权力独占鳌头,支配作用更大一些,而在资本主义时代,政治权力虽然并没有退场,但有所式微,资本的作用在上升。有鉴于此,马克思将人获得解放的道路划分为一个次第进展的阶段性的过程。由于他把宗教问题还原为世俗问题来看待和把握,所以他不认为“宗教解放”是其中一个独立的阶段,所以就没有将在当时讨论得特别热烈的这一方面诉求列入序列。这样,他把人的解放之路规划为“三步走”的过程:第一步是“政治解放”。其含

义不是所谓的“国家独立”“民族自决”等,而是指人们从权力的支配、控制和束缚中解放出来。第二步是“社会解放”,指的是人们从财富和资本的支配、控制和束缚中解放出来。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是人的解放的重大步骤和前提,但是它们是不完备的解放、有缺陷的解放。

虽然“政治解放”摆脱了权力,使人不再受这一方面的支配和控制,但是人还归属于一定的共同体形式,比如国家、民族、集团、群体、阶层和阶级等。如果通过“政治解放”某一国家、民族、集团、群体、阶层和阶级等取得了统治地位,个人就成为这些共同体中的成员,那么在社会生活中就会占据有利的地位,相反如果是敌对的派别,那么就会处于不利的、被压迫的地位。这种情况暴露了所谓的“政治解放”的片面性、局部性,所以,马克思说它是“有缺陷的解放”。人离不开政治权力,但是单纯靠政治权力支配人类社会和人的发展,也会带来无穷的后患。正因如此,马克思对普鲁士宰相俾斯麦通过“铁血政策(Blut und Eisen)”、以强有力的手段和方式统一国家,以及统一之后还以国家的力量来布局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和谋求在欧洲乃至世界的霸权的做法,是有相当保留意见的,甚至给予了非常深刻的批判。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对于政治专制主义批判也是贯穿始终的、相当重要的内容之一。但鉴于《资本论》的巨大影响,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致使长期以来其政治批判被遮蔽和忽略了,论者们于此关注和强调得很少,应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疏漏。

当政治国家成为社会治理、服务的工具,而不是权力支配社会的决定因素和绝对力量的时候,就由资本来发挥作用了。同样地,资本支配的世界也充满了矛盾和对立,会造成两极分化和一系列普遍的竞争和危机,人成为金钱的奴隶、物质的奴隶、资本的奴隶,处于贫困、异化和痛苦状态之中。所以下一步人的解放就进展到“资本解放”阶段。

马克思认为,生活于资本支配的世界,人的生活处于一种“异化”状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举了个例子,在自然界中,“钻石”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矿藏,存量比较稀少,挖掘、冶炼起来也很困难。对于人来说,它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现实生活中物质上的“使用价值”,而在精神层面的“美感”,即在太阳的照耀下,“钻石”发出的美丽的光泽能给人带来心灵上的愉悦和审美满足。但是,它一旦被资本家看到,将其纳入投资的对象、进入资本运作的过程,它的那些“审美性”将被无视或者消失,其价值仅体现在由于稀缺而可以带来无限的财富。在资本时代,由于劳动的“异化”,工人的贫困显而易见,但在马克思看来,在这样的社会,即便是富有的资本家,也难逃“异化”的命运,只看到物的价值、沉湎于对财富和利润的追逐之中,就会摒弃、背离和遗忘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正常的人”的思维、感觉和愿望等,陷入同样是“异化”的状态和境地。在资本的支配操控下,工人因为生活贫困而痛苦,但它也给资本家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使其终日为财富和利润的不满足而焦虑。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异化”的内容、程度有所差异,但形式和本质却是一致的——资本社会就是一个彻底“异化”的世界。

迄今为止,对资本本身功能、作用和效应的认识、把握和理解,仍有进一步调整、拓展和深化的必要。通过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完整解读,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我们体会到资本问题的复杂性。1978年之前,中国虽然也有很多人研究、翻译《资本论》,但是在那个时代,我们很难读懂这本巨作,也就无法全面、准确、到位地认识和理解资本。因为那时我们是站在资本之外,谴责、批判资本的,一种片面的观点支配着我们,即认为资本只能带来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诸如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经济危机乃至战争,我们不知道或者不愿意承认,资本也可以带来社会发展和变革。改革开放40余年来,资本的引入和运行导致中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极其

巨大的变化和深刻的转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回过头去进入《资本论》宽广的社会历史视野和丰富思想世界,才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多个视角来看待资本,全面认识它的功能和作用。正因如此,在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之路的设计和规划中,“社会解放”即人们最终从资本和财富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至此为止,摆脱和超越了政治权力和资本操控的人就是一个“现实的个人”了吗?已经达致“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解放之境了吗?在马克思看来,还没有。这时的人,在“解放”之路上有所前进,外在的束缚和羁绊减弱了,但依然是群体的动物、“类”的存在物。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和阶段的人还在相当程度上附属于共同体,其个性无法彰显,更缺乏建构。所谓“人类解放”中的“人类”是个“类”概念、抽象的范畴,是现实中不同个体共同性的组合、抽象和概括。而人的个性恰恰是排斥这种共同性的,所谓人的个性就是其在世界上、在现实中、在共同体中的唯一性和独自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6]

所以,在笔者看来,以往马克思著述中文版中有关“人类解放”“全人类的解放”的表述翻译为“人的解放”“普遍的个人的解放”才更为准确、更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集中表述及对其观点的详细论证存在于《论犹太人问题》中。这篇著名的论文批判的对象是马克思曾经的导师、青年黑格尔派主将布鲁诺·鲍威尔,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宗教解放”展开。在当时的德国有两个宗教派别,一个是少数人信仰的犹太教,另一个是作为“国教”的基督教。基督教实际上起源于犹太教,后来两派又互相对立。犹太人由于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功,提出政治解放和宗教解放的诉求,力图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相应的尊重和权利。但是,在鲍威尔看来,束

缚犹太人获得解放的,恰恰是其固守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观念;这与基督教徒一样,后者也有进一步解放的问题,而制约其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人”的障碍,也是其狭隘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观念。既然妨碍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获得解放的因素都在于此,作为一个无神论者,鲍威尔提出一种主张,即抛弃宗教、放弃信仰,既不要讲犹太教,也不要讲基督教,他们超越各自狭隘的观念,在“现代”的旗帜下、在“人”的意义上团结起来,获得解放。

对于鲍威尔上述主张,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这个“人”太过抽象了,它不是在现实中可以寄托的希望,而是“思辨哲学”虚构的理念和神话。而当时现实中的人,就是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以及一般的市民社会的成员。所以,他们每个人的解放,实际上是个体的解放。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各种关系还给人自身,而这里的“自身”就是利己的、独立的个体。比如说,基于相同的经济地位、政治权力我们可以把一些人归并为一个阶层,就是说这些人是同一阶层中的人;但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这只是其中一个层面的身份界定和说明,除此而外,他还可以从其他层面、众多领域来透视和分析。即便处于同一阶层中的人,还有局限于阶层、超越阶层的个性;还有,不同阶层的人,也可以在物质的、精神的某些方面显示出相同性;这样多层次、多方位、多视角的交叉和显现,才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多元性和真实性。所以,马克思特别重视一个概念,即“现实的个人”。为此,他特别剖析了共同体与“现实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现实的个人”离开共同体不能生存和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共同体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制约,按照其意愿和意志塑造和培育着现实的人。马克思把这种受共同体制约、支配的个人称为“偶然的人”,认为他们的症结和要害在于,不是“有个性的人”。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改变和超越这种状态。就是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

的个体发展的历史”,^[7]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共同体来说,衡量其是否强大的标准,不是经济繁荣、权力至上,而是在共同体和国家中,每个个体的自由是否得到尊重和发展,其个性和能力是否得到彰显和发挥。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在《资本论》中也反复设想有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到那时,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把许多个人的劳动当成社会劳动来分配,使那些付出巨大艰辛劳动的个人,能重新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劳动成果,重建个人所有制。由这些人组成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往力图以共同体的力量来支配其成员到整个社会生活,最终建立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国家的设想,与马克思这种共产主义社会的意旨是有差异的。

五、结论:马克思伴随我们走向未来

这就是笔者所主张的基于当代的特殊的现实境遇和马克思的原始文献,对其思想进行重新理解的思路和意旨。尤其是笔者所强调的马克思与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思想变革的历程及其实质、马克思复杂的资本理论和他所建构的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的个人”的内涵等,尤显重要。而将这样一种对马克思思想的新理解与当代的社会现实进行对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依然是把握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只要权力和资本仍然是支配、塑造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力量,马克思当年那些深刻的思考就有现实价值,其学说就不会过时。事实上,很多反对甚至有意贬斥马克思学说的论者,在对

复杂的社会结构进行透视的时候,不仅没有排斥,反而无意识地吸收了马克思的总体性、辩证性的思考方式,以及对“人的解放”内涵的深度阐释和实践中的执着追求。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起已经影响了人类进程一个半世纪。但令人深思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并没有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上获得明确的大体一致的认知,反而陷入了一种众说纷纭的境地。很多对马克思的言说、阐释离开了原始文本及其思想发展,20世纪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又存在很多经验、教训尚待总结和汲取。这样的结果是,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这就启示我们,必须回到原始文本、文献,尊重史实和逻辑,并结合当代社会发展和实践,对马克思的思想重新进行梳理、阐释和评价,这既有助于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使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更加全面、客观、准确,同时也有利于实现马克思思想的当代发展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注释:

[1] Tom Rockmore, “On recovering Marx after Marxism”,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vol. 26, no. 4.

[2]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7页。

[3]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4] 《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页。

[5] [8]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422页。

[6] 《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5页。

[7] 《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责任编辑:刘 鏊]